

国内国际双循环政策相互协同吗：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实证

李小平, 张 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国内国际双循环政策的相互协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在搜集 2013—2020 年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文本的基础上,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匹配网络,分析国际合作政策和国内产业政策在推动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中的协同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政策正向“以国内政策为主,国内国际政策相互协同”的“二元协同”政策体系演进;“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呈现出外向型、开拓型、平台型等特征,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则呈现出内向型、调整型、监管型等特征;基于二者的互补关系,将新发展格局政策路径解读为“以国内大循环支撑国际循环,以国际循环反哺国内大循环”。针对政策惯性导致的潜在协调问题,相关建议为协同构建新发展格局政策体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政策协同;政策网络;“一带一路”倡议;产业转型升级;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3)10-0021-13

Do the dual circul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 policies coordinate: Evidence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LI Xiaoping, ZHANG Zhou

(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policy coordination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dual circula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build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Based o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texts about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from 2013 to 202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olicies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policies in promot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 through the insight from the “policy objectives” - “policy instruments” network. This paper finds that China's economic policy is evolving towards a “dual coordination” policy system, which allow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es coordinate each other with the domestic policies as the mainsta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olicy presents characteristics of extraversion, pioneering, and platform-based, while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olic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roversion, adjustment, and supervision. Based on this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policy path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s “supporting the overseas circulation with the domestic, feeding back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with the overseas”.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收稿日期:2023-02-03 修回日期:2023-1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18ZDA0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价值链数字化与中国制造业出口转型研究”(22VRC148)。

作者简介:李小平(1974—),男,湖南邵东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通信作者:张胃。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the coordinated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policy system.

Key words: policy coordination; policy network;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ual circulation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各项公共政策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政策协同配合的高效联动机制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对国内经济循环的依赖程度在 90% 左右,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已基本确立^[2],但构建新发展格局仍面临高端供给不足、国内需求不振、外部环境不稳等问题,相应政策体系仍需不断创新完善。围绕当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如何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政策运行的体制机制,是打通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议题。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联系备受学界关注。大量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贸易往来、经济增长、社会福利、污染减排产生积极影响^[3-5]。“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不仅能够缓解中国产能过剩的负外部性,还有助于提升产业资本配置效率,优化国内产能布局^[6]。同时,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对产品质量、技术水平的高标准会对“一带一路”建设起到推动作用^[7]。值得注意的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国际合作政策和国内产业政策的协同配合。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协同特征,对于完善国内国际双循环政策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政策协同(Policy Coordination)对于发挥复杂政策组合(Policy Mix)的实际效果至关重要^[8-9]。现有文献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公共政策制定在政府垂直管理制度下的纵向传递^[10],以及分权制下

政策在区域或部门间的横向协同^[11]。本文尝试将政策协同的概念拓展至公共政策制定在面对复杂社会治理问题中对立与统一辩证关系时,所采取的系统性优化方法,并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协同为例,考察国内国际双循环视域下经济政策的内外协同特征。

本文选取 2013—2020 年党中央、国务院及各部门有关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将政策文本进行细粒度分解后,构建“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匹配网络,考察国内国际双循环政策组合的协同特征^①。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第一,从内外政策协同视角进一步丰富政策组合研究。当前政策协同研究大多以府际关系为基础^[12]^②,考察单一领域政策组合的部门或区域协作和多级行政体系下的政策传递^[13-14]。然而,较少文献关注到政策组合的内外协同特征。本文将政策协同的概念应用于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互动特征,有助于理解政府在处理复杂社会治理问题中对立与统一辩证关系时的政策逻辑。第二,使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内外政策协同进行深度剖析。本文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匹配网络,采取差异性定量分析、政策网络可视化分析、政策文本定性分析等方法,进一步从政策视角佐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相互协同关系。第三,以现有政策网络为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政策体系。当前有关新发展格局政策优化的相关文献多是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5-16],而较少对现有政策进行细粒度分解。本文在分析现有中国国际合作政策和

① 2015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与行动》)和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本文选取以上两份标志性中央政策文件的发布分别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起点。党中央于 2020 年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故政策文本的搜集截止于 2020 年,以考察新发展格局提出前的政策协同特征与演进趋势。政策文件来源于“一带一路”网、中国政府网政策文件库和国务院各部委政策文件库等。

② “府际关系”是指政府内部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关系,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国内产业政策协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国内外经济政策的演化趋势,并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实施路径。

一、文献回顾

政策组合这一概念源于经济政策选择的辩论^③,其被定义为当政策制定面临多目标、多层次、多要素复杂环境时,对相关政策工具的选择采取协调、权衡与妥协等优化措施^[7]。政策工具选择理论由20世纪80年代以Salamon^[18]为代表的单一政策工具分析,到20世纪90年代以Howlett^[19]为代表的政策工具选择比较研究,至今发展至“第三代”以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复杂性为基础的最优政策组合理论^[20]。对于政策工具的分类,学界比较主流的方式是采取Rothwell等^[21]的分类标准,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3种类型^[22]^④。

大量文献以此为基础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进行拓展性研究。一是从国家层面的政策组合出发,认为政策效果的有效发挥依赖于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紧密配合。如Borrás等^[23]基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上创新政策工具使用的差异性特征,发现创新政策制定往往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组织背景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由此识别出政策组合的“系统性”特征;通过分析欧洲节能政策,相关研究指出推进可持续发展转型需要在破除旧有体制的基础上建立创新体系^[23],且技术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政策工具的配合对于推动社会转型具有显著作用^[24]。二是将研究视角下沉至区域层面,发现政策组合随着行政级别的增加而产生更加复杂的相互影响^[25]。这些基于府际关系的互动效应应包括自上而下(Top-down)和自下而上(Bottom-up)的政策扩散^[10],以及区域或部门间的竞争与合作^[11,27]。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理由。然而,社会

治理是一项庞大而繁杂的系统工程,对系统协调的要求较高^[28],同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11],这共同塑造了政策协同的内生动力。政策协同通过对政策主体间权力和利益的调整与整合,形成连贯一致的目标和行动,降低由于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等原因造成的政策冲突、摩擦和失灵,提高政策运行效率,推动复杂跨界问题的解决^[29]。政策协同从不同层次来看包括国家间战略宏观协同,如区域或集团内国家为实现一致目标而进行的政策协调^[30-31];基于府际关系的中观协同,包括以政府垂直管理制度为基础的纵向协同^[13,32],同级行政区域或部门间的横向协同^[11-12,21,33];政策工具的微观协同,包括某一政策工具根据实施情景的变化而进行的动态调整和政策工具间的强弱协调^[34-36]。

现有文献主要采取以下3种方式对政策协同进行识别和衡量。一是根据政策本身对资源要素进行优化配置的协调特性,采用事件分析方法对政策协同效应进行因果识别。如李建成等^[33]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成立作为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政府干预事件,发现政府主导的市场整合显著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创新合作行为;彭红枫等^[31]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作为沿线国家资本管制政策调整的事件冲击,考察中国资本流出管制放松对沿线国家资本流入管制的影响,发现资本项目开放政策协同能够显著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二是基于政策在不同维度下的数量特征,构建协同效力指标。如彭纪生等^[11]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3个维度构建创新政策量化手册,通过对不同维度下的政策力度进行赋值,采用累积法测量了中国1979—2006年创新政策的部门协同、措施协同以及目标协同情况。三是对政策文本进行细粒度分解,考察政策网络框架下

③ Flanagan等^[8]提到政策组合的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有关经济政策选择的辩论。具有代表性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关于开放条件下不同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16]。

④ 该方法将繁杂的政策工具进行聚类,每一个维度的政策措施具有显著的关联。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指的是政府通过提供信息服务、资金支持、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培训等方式从供给端支持产业发展,以此推动实现政策目标;需求型政策工具则注重政府在调控市场需求方面的作用,如政府采购、价格补偿、税收调整等,从而拉动企业进行研发和生产;环境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通过制定战略规划、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多元政策主体和不同政策工具在目标、行为上的协调关系。黄萃等^[13]通过构建国务院各部门科技政策制定合作网络,分析了不同阶段的府际横向合作特征,发现了中国府际合作网络向复杂化、中心化演进的趋势。

数字时代的来临深刻影响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其所带来的核心变革一方面是爆发式增长的社会数据,另一方面是便捷的数据传播方式^[37]。随着我国数字政务和各级政府政策文件库的建立和完善,文本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研究及其相关领域^[12,38]。从以往研究发现,基于研究内容和文本特征可将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开展公共政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完备的分类(见表1)。

表1 政策文本分析文献分类

维度		研究内容	
		描述性推论	因果推论
文本特征	形式特征	(一)	(二)
	内容特征	(三)	(四)

注:政策文本分析文献分类方法参考黄萃等^[39]。

第一部分为基于形式特征的描述性推论分析,该类研究所使用的文本往往具有明显的结构框架。研究者可以借助政策文本的标题、主体、时间、主题词、文件参照关系等特征,对不同主体的态度、立场和行为规律进行时空比较。如黄凯丽等^[40]对“一带一路”政策文本形式、政策主体、政策涉及领域和政策年份进行统计,从宏观层面加深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领域、发展方向和所面临问题的认识。第二部分为基于形式特征的因果推断,由于文本的形式特征具有较强的“外生性”,仅仅根据形式特征考察不同主体间的差异往往难以揭示研究问题的内在机理^[39],一种可取的办法便是将文本的形式特征置于社会互动关系的时间和空间中去,以此提供较好的因果推断环境。现有研究借助网络动力学模型(例如指数随机图模型和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探究社会网络形成的驱动因素,并强调了优先连接逻辑和权威性逻辑在发挥社会网络协同效应中的重要性^[41-42]。第三部分为基于内容特征的描述性文本分析,属于现有文献相对主流的研究范畴。相较于形式特征而言,文本的内容特征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复杂,

同时也意味着研究者可以从复杂语义的背后解读出更深层次的内涵。该类公共政策研究常以政策工具为视角,基于主观编码体系,考察政策工具及其组合特征,如政策工具的分布特征及国际比较^[43]、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匹配^[44]以及政策协同性等问题^[32,45-46]。如胡志明等^[32]发现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体系在纵向上高度协同,“政治势能”对于中央和地方之间政策协同效应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第四部分为基于内容特征的因果推断研究,此类研究旨在通过获取文本内容的语义特征,深入挖掘社会现象背后的驱动因素,即研究文本“生产者”如何将观点与见解通过文字影响文本“接受者”的态度和行为^[47]。如徐国冲等^[48]根据中央政府部门的横向监管合作文件发现,制度约束和权威性组织是政策协同的主要动力。

综上所述,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要求公共政策制定在面对社会矛盾时进行审慎权衡、兼顾与协调,例如公平与效率、个人与集体、安全与开放等等。然而,现有文献较少关注并分析公共政策在处理社会治理中对立与统一辩证关系时的协同特征。此外,现有文献均从因果识别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尚无文献基于政策文本内容特征对二者的协同情况与演化趋势进行描述与分析。因此,本文将政策协同的概念应用于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互动特征,使用定性定量相结合方法对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关政策进行深度剖析,考察内外政策体系的相互协同情况。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 研究方法

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是进行政策分析时经常使用的两个维度^[32,49]。“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匹配网络的构建可分为以下3个步骤^[49]。

第一步,文本清洗与识别。识别政策文件的引言段落和“关键词”段落;创建一个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相关的“动词/名词”词库;对高度相似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按照“动词+名词”的语句结构进行统一表述。

第二步,“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匹配。构建

“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二元政策网络结构,本文采取完全覆盖的原则对所有相关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进行配对。

第三步, 衡量政策网络节点的重要程度。本研究借鉴图论中的特征向量中心度来衡量节点的重要程度, 其得分不仅取决于节点自身的重要程度, 同时也取决于与其相连的节点的重要程度。设政策网络为图 $G(V, E)$, 包含 $|V|$ 个节点和 $|E|$ 个边, $A = (a_{v,t})$ 为图 G 的邻接矩阵。如果节点 v 与节点 t 相连, 则 $a_{v,t} = 1$, 否则 $a_{v,t} = 0$, 节点 v 的特征向量中心度得分可以表示为:

$$x_v = \frac{1}{\lambda} \sum_{t \in M(v)} x_t = \frac{1}{\lambda} \sum_{t \in G} a_{v,t} x_t \quad (1)$$

式(1)中, $M(v)$ 是节 v 的邻节点, λ 为一个常数。上式也可写为一个求解公式:

$$AX = \lambda X \quad (2)$$

通常存在不同的特征值 λ 使得上式存在非零解,但由于结果的非负性,通常取 λ 的最大值,便可计算节点 v 特征向量的相关得分。

2. 数据搜集与处理

本文以《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和《决定》(2013年11月)的发布分别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搜集的时间起点,所搜集的政策文本类型包括:意见、通知、规划、方案、行动计划等。为保障数据的全面性与准确性,本文研究在采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两点:①采用关键词全文搜索,关键词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等,过滤“函”“明电”“请示”“批复”等文件;②为提高政策文本与政策主题的相关性,在对政策内容进行初步阅读后,去除相关性较低的政策文件,同时将转发和抄送文件予以剔除,最终得到161份政策文本,其中有关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文件56份和“产业转型升级”文件105份。

三、结果及分析

(一)政策重心

政策文本的内容特征主要通过其复杂的语义特征进行表达,词频特征可以帮助了解政策内容,高频词语能够代表政策重心^[43]。

本文对 161 份政策文件进行词频统计并绘制词云(见图 1 和图 2),借鉴李政等^[43]对文本词频的处理方式,将高频词汇分为政策对象和政策行为,按二字词和三字词分别进行词频统计(见表 2 至表 5)。“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对象词汇中,二字词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贸易”“企业”“国际”,三字词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进出口”“人民币”“服务业”;政策行为词汇中,二字词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合作”“发展”“服务”,三字词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试验区”“标准化”“投融资”。



图1 “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文本词云



图2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文本词云

表 2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对象(前 10 位)

二字词	频数/次	加权百分比/%	三字词	频数/次	加权百分比/%
贸易	1 545	0.88	进出口	193	0.11
企业	1 447	0.83	人民币	192	0.11
国际	1 431	0.82	服务业	158	0.09
投资	1 064	0.61	制造业	95	0.05
技术	958	0.55	互联网	87	0.05
机制	838	0.48	经济带	85	0.05
机构	740	0.42	竞争力	74	0.04
金融	725	0.41	投资者	67	0.04
制度	687	0.39	贸易区	62	0.04
产业	649	0.37	境内外	60	0.03

表 3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政策行为(前 10 位)

二字词	频数/次	加权百分比/%	三字词	频数/次	加权百分比/%
合作	1 752	1.00	试验区	1 515	0.87
发展	1 742	1.00	标准化	197	0.11
服务	1 635	0.94	投融资	113	0.07
建设	1 481	0.85	示范区	85	0.05
支持	1 283	0.73	一体化	79	0.05
监管	1 185	0.68	信息化	76	0.04
管理	1 067	0.61	保税区	76	0.04
创新	875	0.44	国际化	72	0.04
开放	573	0.33	市场化	57	0.03
试点	563	0.32	自由化	47	0.03

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对象词汇中,二字词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技术”“企业”“产业”,三字词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互联网”“农产品”“制造业”;政策行为词汇中,二字词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发展”“创新”“服务”;三字词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信息化”“智能化”“标准化”。

表 4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对象(前 10 位)

二字词	频数/次	加权百分比/%	三字词	频数/次	加权百分比/%
技术	4 395	1.42	互联网	675	0.22
企业	3 584	1.16	农产品	357	0.12
产业	2 328	0.75	制造业	311	0.10
标准	1 643	0.53	消费品	293	0.09
市场	1 505	0.49	服务业	255	0.08
质量	1 441	0.47	竞争力	245	0.08
体系	1 437	0.46	产业链	212	0.07
机制	1 271	0.41	示范区	155	0.05
产品	1 269	0.41	消费者	142	0.05
信息	1 249	0.40	毕业生	133	0.04

表 5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政策行为(前 10 位)

二字词	频数/次	加权百分比/%	三字词	频数/次	加权百分比/%
发展	4 403	1.42	信息化	396	0.13
创新	2 968	0.96	标准化	390	0.13
服务	2 613	0.84	智能化	332	0.11
建设	2 567	0.83	市场化	195	0.06
支持	1 794	0.58	产业化	190	0.06
管理	1 452	0.47	机械化	179	0.06
完善	1 389	0.45	专业化	144	0.06
建立	1 331	0.43	一体化	127	0.04
开展	1 282	0.41	国际化	111	0.04
改革	1 265	0.41	现代化	87	0.03

(二)核心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

本文共识别出有关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 20 种政策目标和 89 种政策工具,形成 372 个“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匹配组合;有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 37 种政策目标和 155 种政策工具,形成 962 个“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匹配组合。

1. 核心政策目标

如表 6 所示,“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目标中,特征向量中心度得分最高的是“深化沿线经贸合作”,例如《愿景与行动》和《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等政策概念性文件均将“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指向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其次是“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例如 2015 年出台的《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和 2020 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表明贸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余的核心政策目标则聚焦在国际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企业“走出去”、服务贸易、对外投融资、外贸创新发展、绿色“一带一路”等。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政策目标紧紧围绕“五通”建设,其中贸易畅通、设施联通和金融通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方向。

表 6 核心政策目标

排名	“一带一路”倡议		产业转型升级	
	名称	E	名称	E
1	深化沿线经贸合作	0.356	提高创新能力	0.326
2	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0.314	推进智能制造	0.266
3	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0.305	加强质量品牌建设	0.264
4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0.287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0.256
5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0.281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	0.223
6	支持企业“走出去”	0.277	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0.222
7	发展服务贸易	0.256	促进消费升级	0.216
8	推进对外投融资工作	0.199	推动实体经济转型	0.213
9	促进外贸平衡发展	0.197	化解产能过剩	0.195
10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0.189	推动绿色转型	0.192

注:笔者根据核心政策目标特征向量中心度,取排名前 10,整理而得。E 表示特征向量中心度。

表 6 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目标中,特征向量中心度得分最高的是“提高创新能力”,如《决定》《中国制造 2025》和《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等文件,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创新驱动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其余的核心政策目标为“推进智能制造”、“加强质

量品牌建设”“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促进农业转型升级”“促进消费升级”“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化解产能过剩”和“推动绿色转型”。这些政策目标反映了中国政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作主线。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与产业转型升级在创新驱动、产能调整和绿色发展等政策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前者的政策目标着眼于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通过扩大生产分工和开辟新的国际合作通道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后者的政策目标则立足于国内市场和资源,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力,以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孵化培育、弱化数量增长强调质量提升为主要内容。两种政策体系在核心政策目标上的分布特征分别体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主要政策方向。

2. 核心政策工具

如表 7 所示,“一带一路”倡议核心政策工具中,环境型政策工具有 6 个,分别是“制定指导性方针政策”“督促任务落实”“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完善人员流通服务”和“提高通关效率”;供给型政策工具有 2 个,分别是“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和“开展职业培训”;需求型政策工具有 2 个,为“降低贸易壁垒”和“扩大人民币结算范围”。这表明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提供人力和资金支持以及降低贸易壁垒等方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核心政策工具中,环境型政策工具有 7 个,分别是“督促任务落实”“制定指导性方针政策”“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建立协调工作机制”“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建立信用体系”和“加强标准体系建设”;供给型政策工具有 3 个,分别是“开展职业培训”“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和“拓宽融资渠道”;需求型政策工具存在缺失。这表明中央政府主要通过人力、资金和信息支持,建立健全政策实施体系以及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内生动力和扫清障碍阻力。

表 7 核心政策工具

排名	一带一路			产业转型升级		
	名称	E	类型	名称	E	类型
1	制定指导性方针政策	0.268	环境型	督促任务落实	0.210	环境型
2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0.251	供给型	制定指导性方针政策	0.203	环境型
3	开展职业培训	0.223	供给型	开展职业培训	0.202	供给型
4	督促任务落实	0.216	环境型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0.201	供给型
5	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0.190	环境型	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0.199	环境型
6	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0.184	环境型	建立协调工作机制	0.199	环境型
7	服务国际人员往来	0.174	环境型	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0.195	环境型
8	降低贸易壁垒	0.169	需求型	建立信用体系	0.195	环境型
9	扩大人民币结算范围	0.159	需求型	拓宽制造业融资渠道	0.189	供给型
10	提高通关效率	0.155	环境型	加强行业标准研制	0.189	环境型

注:笔者根据核心政策工具的特征向量中心度,取排名前 10,整理而得。E 表示特征向量中心度。

通过比较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与产业转型升级在核心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既体现出中央政府在推进经济建设工作中所发挥的核心职能,又反映出内外经济政策的差异性;既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又表现出各自独特的行为逻辑。“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工具使用的核心行为逻辑在于“通”,具体表现为畅通人员、资金、货物和信息的国际往来;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工具使用的核心行为逻辑在于“放、管、服”,具体表现为精简政府机构、下放行政权力、创新监管方式、维护公平竞争、提高服务效率。

(三)政策协同性分析

本文在合并政策网络中采用差异性定量分析、政策网络可视化和政策文本定性分析三种方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体系的协同特征^[32,46,49]。

1. 差异性定量分析

从政策工具使用偏好来看(见表 8),“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体系中均存在结构性不对称问题,两种政策体系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均相对薄弱。“一带一路”倡议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仅占 19.81%,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这一占比分别为 25.47% 和 54.72%;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仅占 16.77%,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这一占比分别为 32.90% 和 50.33%。

表 8 政策工具使用偏好

类型	“一带一路”倡议		产业转型升级		合并后	
	频数/次	频率/%	频数/次	频率/%	频数/次	频率/%
供给型	27	25.47	51	32.90	61	30.35
需求型	21	19.81	26	16.77	36	17.91
环境型	58	54.72	78	50.33	104	51.74
总计	106	100	155	100	201	100

本文参考胡志明等^[32],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分析不同组别下政策工具使用的差异性。以政策体系为分组变量,对两种政策体系的政策工具数量进行 MannWhitney 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MannWhitney 检验 Z 值为 -0.655 , $p = 0.513 > 0.05$,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工具选择中,形成了相对一致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在政策体系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政策工具数量上的差异体现出二者的主次关系。

表 9 以政策体系为分组变量的 MannWhitney 检验结果

变量	政策体系 中位数 $M(P_{25}, P_{75})$		MannWhitney 检验 U 值	MannWhitney 检验 Z 值	p
	一带一路 ($n = 3$)	产业转型升级 ($n = 3$)			
频数	27.0(21.0,58.0)	51.0(26.0,78.0)	3.000	-0.655	0.513

以政策类型为分组变量,对 3 种类型的政策工具进行 Kruskal-Wallis 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Kruskal-Wallis 检验 H 值为 4.571 , $p = 0.102 > 0.05$ 。结果显示,尽管政策工具组合及其数量构成在两种政策体系间没有明显差异,但整体上对于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选择却存在一定偏好。如表 8 显示,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在合并政策体系的分布上,环境

型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数量关系大约是 $2.9:1.7:1$,这一数量关系在两种独立政策体系中分别为 $2.8:1.3:1$ 和 $3:2:1$,形成了类似于阶梯式分布的差序格局。

表 10 以政策类型为分组变量的 Kruskal-Wallis 检验结果

变量	政策工具 中位数 $M(P_{25}, P_{75})$			Kruskal-Wallis 检验统计量 H 值	p
	供给型 ($n = 2$)	环境型 ($n = 2$)	需求型 ($n = 2$)		
频数	39.0 (27.0,51.0)	68.0 (58.0,78.0)	23.5 (21.0,26.0)	4.571	0.102

2. 政策网络可视化分析

接下来,本文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合并网络进行可视化分析。如图 4 所示,“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网络置于右边(节点 A—节点 PA),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网络置于左边(节点 B—节点 PB),相同政策工具置于二者之间,由此形成两种政策体系既相互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复杂网络体系,二者通过相互关联的政策目标(节点 C)和相互一致的政策工具(节点 PC)而构成统一的政策体系。总体来看,左侧的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网络无论在节点数量还是匹配密度上均比右侧的“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网络更加复杂。

从图 3 可以发现,两种政策体系使用的相同政策工具在合并网络中的节点明显大于两种政策体系各自独有的政策工具,这表明二者在核心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存在较大程度重合,二者的核心政策行为逻辑趋同,同时大量独特政策工具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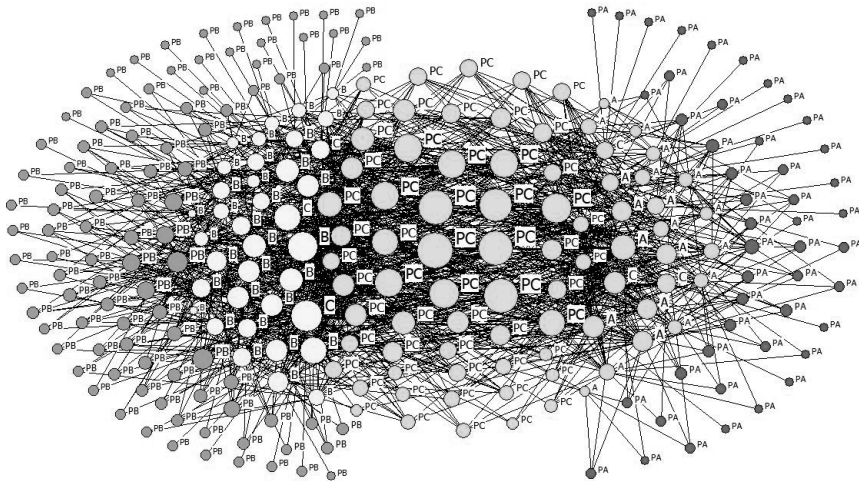


图 3 “一带一路”倡议与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体系关系

反映出二者在实现政策目标的具体路径上存在一定差异。合并网络的核心政策目标中,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目标占据9席,而“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目标仅占1席。这一数量上的不均等现象揭示了两种政策体系在合并政策网络中的相对地位,即产业转型升级处于相对主要地位,“一带一路”倡议处于相对次要地位。这一相对主次地位表明,中国经济政策正向“以国内政策体系为主,国内国际政策体系相互协同”的“二元协同”政策体系演进。可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与以往的政策惯性具有一定关联。

3. 政策文本定性分析

通过对文本内容的描述性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复杂语义背后政策工具的使用倾向,即表1中基于内容特征的政策文本描述性分析^[39]。下面分别从相同政策目标下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和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进一步剖析两种政策体系的协同特征。

(1) 相同政策目标下政策工具协同特征

由前文表6可知,“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在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和产能调整上具有一致的核心政策目标^⑤。表11列举了3个政策目标分别在两种政策体系中所对应的政策工具,这里选取每个政策目标下特征向量中心度排名前五和后五的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⑥。

为实现创新驱动,两种政策体系在排名前五的政策工具中都采用了“制定指导性方针政策”“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开展职业培训”和“建立协调工作机制”,说明政府在创新政策中已经意识到人才、资金和技术是促进创新的关键要素,并十分重视政策实施的顶层设计和部门协调。从排名后五的政策工具来看,“一带一路”倡议采用了促贸平台建设、出口信贷支持、出口产品质量检测、扩大服务进口和扩大优质货物进口等政策工

具,推动外贸创新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则采用财政资金引导、创新型城市试点、规范涉企收费、支持创新企业上市和创新孵化平台建设等政策工具,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表 11 相同政策目标下政策工具使用情况比较

相同政策目标	政策工具		
	排名	“一带一路”倡议	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	前五	制定指导性方针政策	制定指导性方针政策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开展职业培训
		开展职业培训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建立协调工作机制	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建立协调工作机制
	后五	推进促贸平台建设	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提供出口信贷支持	建设示范工程
		加强出口产品质量检测	规范涉企收费
		扩大服务进口	支持创新企业上市
		扩大优质货物进口	建设创新创业孵化平台
产能调整	前五	制定指导性方针政策	制定指导性方针政策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建立协调工作机制
		开展职业培训	建立信用体系
		完善人员流通服务	加强标准体系建设
		加强政府间交流协调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后五	开拓国际重大建设项目	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
		提供融资担保	落实赋税公平
		推动国家战略对接	妥善处置不良资产
		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做好外交服务工作	严控新增产能
绿色发展	前五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督促任务落实
		建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制定指导性方针政策
		制定指导性方针政策	开展职业培训
		督促任务落实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后五	设立境外合作园区	完善产业园配套设施
		健全绿色金融制度体系	设立循环产业园区
		参与国际绿色标准制定	建立环保财政补助机制
		增加绿色产品的政府采购	制定环保准入标准
		开展绿色对外援助工作	推进环境保护费改税

为进行产能调整,两种政策体系在排名前五的政策工具中均采用了“制定指导性政策方针政策”,二者在核心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有明显差异,“一带一路”倡议重视人才、资金和国家间政策协调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中的作用,产业转型升级则重视信用体系、标准体系和法律体系建设在化解产能过剩中的作用。从排名后五的政策工具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侧重于通过开拓海外市场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产业转型升级则强调通过加强市场监管或下达行政命令,强化过剩产能跟踪治理,两种政

⑤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分属国际和国内政策,二者自然在相同领域的政策话语表达上会存在一定差异,但并不妨碍将其识别为相同政策目标。

⑥ 此处选取每个相同政策目标下特征向量中心度排名前五和后五的政策工具进行分析,通过对比排名前五的政策工具,可以考察某一共同政策目标下政策工具使用的一致性;而通过对比排名后五的政策工具,可以考察某一共同政策目标下政策工具使用的独特性,并判断政策工具的使用是否存在对立、背离、承接、呼应、互补或一致等相关关系。

策体系所采用的政策工具呈现一定互补性。

为推动绿色发展,两种政策体系在排名前五的政策工具中均采用了“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制定指导性方针政策”和“督促任务落实”。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政策工具还包括“建设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和“搭建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政策工具还包括“开展职业培训”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从排名后五的政策工具来看,两种政策体系所采用的政策工具呈现一致性,均围绕产业园区建设、金融制度改革、财政税收支持和标准体系建设等政策工具开展具体工作。

从政策目标来看,两种政策体系在创新驱动、产能调整和绿色发展等议题上所反映出二者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从政策工具的使用来看,两种政策体系的核心政策行为趋同,其中提供财政资金、教育培训和宏观指导,并组织政策协调和落实是推动内外经济循环畅通中核心且一致的政策工具。而二者在各自独有的政策工具使用上呈现出差异性、互补性和一致性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推动内外经济循环畅通的政策逻辑。一方面,国际经济循环依赖于国内大循环的支撑,这不仅体现在发挥国内大型龙头企业在开拓国际重大建设项目的带动作用,还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对国内成功政策和制度的借鉴,如设立境外产业园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内开发区和高新区的建设经验。另一方面,推动国际经济循环的底层政策逻辑和最终目的是通过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和技术反哺国内经济循环。如扩大服务进口和优质货物进口有利于国内企业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生产和管理经验;参与国际绿色标准制定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绿色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能够倒逼国内企业绿色转型。基于此,本文将新发展格局的政策路径解读为“以国内大循环支撑国际循环,以国际循环反哺国内大循环”。

(2) 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协同特征

在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分别选取 3 个典型政策工具主题,供给型包括财政货币、科技、教育,需求型包括税收、流通、政府采购,环境型包括市场准入、行业标准、产业园建设,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政策协同框架的基础上(见

图 4),进一步重点分析国内大循环的“支撑”作用和国际循环的“反哺”作用。



图 4 国内国际双循环政策协同框架

如图 4 所示,从供给型政策工具来看,国际循环政策强调通过吸引国际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对国内供给体系形成有益补充,使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支持发行境外人民币债券、共建联合实验室、开展联合人才培养等;国内大循环则通过采取完善财政补贴机制、加强国家实验室建设、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等政策工具,引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国内高质量供给向国际外溢,从本土供给端为中国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支撑。

从需求型政策工具来看,国际循环政策强调通过扩大开放增强内需,扩大开放有助于增加居民收入,通过发挥“收入增长—消费增加”的“乘数效应”形成提振内需的正向循环,并且通过增加国内供给和市场竞争,提升商品质量和性价比,进而刺激国内消费,使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升中欧班列运行质量、推动政府采购市场对外开放等;国内大循环政策则立足于发挥“本地市场效应”,在强大内需的虹吸效应下,吸收更多中高端生产环节的同时,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使用的政策工具包括落实税收减免政策、优化交通网络布局、调整政府采购结构等。

从环境型政策工具来看,国际循环政策通过推进市场准入谈判为企业“走出去”拓展市场空间,通过加强国际标准对接提升国内国际标准一

致性,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联通,实现国内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提升,通过推进境外产业园建设助力企业“抱团式”出海,并发挥产业集聚优势;而国内大循环政策则强调通过优化国内营商环境,为推动制度型开放提供基础,使用的政策工具包括实施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立行业准入制度、加强行业标准研制,以及推动国家高新区与自贸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政策试点相融合,复制推广先行先试经验,鼓励与境外产业园区合作等。

通过分析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协同情况发现,国际循环政策工具呈现出外向型、开拓型、平台型等特征,国内大循环政策工具呈现出内向型、调整型、监管型等特征,二者共同构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补、互嵌、互融的“二元协同”政策体系。

此外,现有政策路径存在以下3点潜在协调问题。①增加财政支出与减税降费造成的政府财政压力,这一定程度上会挤压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并导致地方债增长。减税降费的目的是通过“放水养鱼”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并拓展远期税源^[50]。通过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缩减行政开支、提升财政补贴精度等措施有助于调节增加财政支出与减税降费之间的矛盾。②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冲突与协调。在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应以弥补市场失灵的普惠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加强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政策支持;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通过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逐步消除地方保护、行政壁垒、不正当竞争等现象。③“一带一路”多元主体下规则和标准的柔性性与刚性调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制度、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需对相关规则的普适性和特殊性进行协调。“一带一路”国际规则体系构建应基于现有国际规则体系,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为原则,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数字贸易规则、重大项目建设与管理等领域寻求创新突破。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匹配网络,

对有关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文本进行细粒度分解,系统分析了两种政策体系的主要目标导向、核心政策路径、政策网络特征以及政策协同情况等。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一致的政策目标和互补的政策工具构成国内国际“二元协同”政策体系,二者在创新驱动、产能调整和绿色发展等核心政策目标上趋同,“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工具的外向型、开拓型、平台型特征与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工具的内向型、调整型、监管型特征形成互补。二者在政策工具使用数量上的差异体现出“产业转型升级为主,‘一带一路’倡议为辅”的主次特征,这反映了中国经济政策向“国内政策为主,国内国际政策协同互动”的演进趋势,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与以往的政策惯性存在一定关联性。基于内外经济政策的协同特征,本文将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路径解读为“以国内大循环支撑国际循环,以国际循环反哺国内大循环”,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新发展格局政策体系的构建应在现有政策体系基础上,根据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互动特征对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进行系统性优化:①聚焦于国内国际共同的政策主题,避免内外政策目标对立,加强政策工具的协同配合。将政策目标聚焦于创新驱动、产能调整和绿色发展等共同的政策目标,在推动国际技术转移的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推动国际标准对接的同时注重提升自主标准的国际话语权,在推动金融开放的同时兼顾收益与风险的平衡。依托“中欧班列”陆港建设提升内陆地区开放水平,以此扩大内陆地区对于优质产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清洁能源等进口,为国内产能布局由东部沿海向内陆转移创造有利条件。②推动国内国际市场联通和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需建立跨部门、跨区域政策协同运行机制,避免出现“各自为政”和“以邻为壑”的现象。横向上,需要建立权威性组织在推动区域和部门协作中发挥中介作用,以信息沟通为切入点,逐步扩散至目标整合和形成共同规范,如建立专题工作小组、部门联席会议、区域经济协调会等。纵向上,需要加强政策传递的时效性和一致性,重点解决政策对立冲突、延缓滞后、执行梗阻

等问题,充分利用数字政务系统和大数据协同中心,实现政策体系运行的流程优化和效率提升。

第二,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政策与中国产业政策的耦合度,“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在政策目标上的融合度,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匹配度。政策工具的选取应紧扣以上 3 种逻辑关系进行适当安排:①政府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关税壁垒、外资管制、项目审批、标准体系、金融监管、劳工权益等方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服务,建立与沿线国家间的政策协调机制,为企业挖掘国际需求潜力、对外投资风险预警提供制度支持,统一协调处理跨国政策衔接工作,弱化由于国家间政策法规差异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②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在科技创新资源引进、绿色标准对接、国际产能转移中的枢纽作用,组织国际化人才交流和培训,完善科技人才引进配套措施,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同时落实《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推进绿色发展重点领域合作,避免在国际产能转移过程中形成新的“污染天堂”;③“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应最终服务于推动国内国际供需体系在更高水平实现良性互动,要依托中国进口博览会等促贸平台进一步扩大自“一带一路”沿线进口,并借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功经验,积极推动与更多有意愿的“一带一路”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加强国际供给体系与国内需求体系对接,还要进一步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发挥民营经济在稳就业、促增收、扩内需中的重要作用,以强大内需吸引国际优质要素资源。

参考文献:

- [1]李志军.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政策评估体系[J]. 管理世界, 2022, 38(12): 84-92.
- [2]黄群慧,倪红福.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兼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J]. 管理世界, 2021, 37(12): 40-58.
- [3]DE SOYRES F, MULABDIC A, RUTA M. Commo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 quantitative model and estimates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0(143): 102415.
- [4]BANIYA S, ROCHA N, RUTA M. Trade effects of the New Silk Road: a gravity analysi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0(146): 102467.
- [5]余东升,李小平,李慧.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降低城市环境污染: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统计研究, 2021, 38(6): 44-56.
- [6]吴福象,段巍. 国际产能合作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2): 44-64.
- [7]张可云,蔡之兵. 全球化 4.0、区域协调发展 4.0 与工业 4.0:“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内在本质与关键动力[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8(3): 87-92.
- [8]FLANAGAN K, UYARRA E, LARANJA M. Reconceptualising the ‘policy mix’ for innovation[J]. Research policy, 2011, 40(5): 702-713.
- [9]MAVROT C, HADORN S, SAGER F. Mapping the mix: linking instruments, settings and target groups in the study of policy mixes[J]. Research policy, 2019, 48(10): 103614.
- [10]SHIPAN C R, VOLDEN C. The mechanisms of policy diffus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 52(4): 840-857.
- [11]彭纪生,仲为国,孙文祥. 政策测量、政策协同演变与经济绩效:基于创新政策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8(9): 25-36.
- [12]谢庆奎. 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1): 26-34.
- [13]黄萃,任弢,李江,等. 责任与利益:基于政策文献量化分析的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府际合作关系演进研究[J]. 管理世界, 2015(12): 68-81.
- [14]MAGGETTI M, TREIN P.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problem-solving: towards a dynamic theory of multilevel policy-making?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9, 97(2): 355-369.
- [15]黄群慧.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21, 56(4): 4-23.
- [16]裴长洪,刘洪愧. 构建新发展格局科学内涵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6): 5-22.
- [17]MUNDELL R A.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63, 29(4): 475-485.
- [18]SALAMON L M. Rethinking public management: third-party government and the changing forms of government action[J]. Public policy, 1981, 29(3): 255-275.
- [19]HOWLETT M. Policy instruments, policy style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national approaches to theories of instrument choice[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1991, 19(2): 1-21.
- [20]HOWLETT M, RAYNER J. Design principles for

- policy mixes: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new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J]. Policy and society, 2007, 26(4): 1-18.
- [21] ROTHWELL R.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towards a national policy framework[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1985, 12(3): 113-130.
- [22] 赵晶, 迟旭, 孙泽君. “协调统一”还是“各自为政”: 政策协同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8): 175-192.
- [23] BORRÁS S, EDQUIST C. The choice of innovation policy instruments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3, 80(8): 1513-1522.
- [24] KIVIMAA P, KERN F. Creative destruction or mere niche support? innovation policy mixes for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1): 205-217.
- [25] NUNEZ-JIMENEZ A, KNOERI C, HOPPMANN J. Beyond innovation and deployment: modeling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push and demand-pull policies in Germany's solar policy mix[J]. Research policy, 2022, 51(10): 104585.
- [26] MAGRO E, WILSON J R. Policy-mix evaluation: governance challenges from new place-based innovation policies [J]. Research policy, 2019, 48(10): 103612.
- [27]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 2007(7): 36-50.
- [28] 范如国. 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4): 98-120.
- [29] 周志忍, 蒋敏娟. 整体政府下的政策协同: 理论与发达国家的当代实践[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0(6): 28-33.
- [30] LINDBERG M B, MARKARD J, ANDERSEN A D. Policies, actors and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pathways: a study of the EU's energy policy mix[J]. Research policy, 2019, 48(10): 103668.
- [31] 彭红枫, 余静文. 政策协同与经济增长: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J]. 世界经济, 2022, 45(12): 29-51.
- [32] 胡志明, 马辉民, 张金隆, 等.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的纵向协同性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22, 40(2): 237-246.
- [33] 李建成, 程玲, 吴明琴. 政府协调下的市场整合与企业创新伙伴选择[J]. 世界经济, 2022, 45(4): 187-216.
- [34] 俞乔. 论我国汇率政策与国内经济目标的冲突及协调[J]. 经济研究, 1999(7): 23-32.
- [35] RIO P. Interactions between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ies: the case of Spain[J]. Climate policy, 2009, 9(2): 119-138.
- [36] 方意, 赵胜民, 谢晓闻. 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分析: 兼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问题[J]. 管理世界, 2012(11): 9-19.
- [37] HEY T, TANSLEY S, TOLLE K. 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 [M]. Redmond: Microsoft research, 2009: 17-31.
- [38] 李江, 刘源浩, 黄萃, 等. 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 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 12(2): 138-144.
- [39] 黄萃, 吕立远. 文本分析方法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应用[J]. 公共管理评论, 2020, 2(4): 156-175.
- [40] 黄凯丽, 赵频.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J]. 情报杂志, 2018, 37(1): 53-58.
- [41] ZHANG C, BU Y, DING Y. 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homophily, transitivity, and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 69(1): 72-86.
- [42] 霍龙霞, 徐国冲. 走向合作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方式的演变逻辑: 基于438份中央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1979—2017)[J]. 公共管理评论, 2020, 2(1): 68-91.
- [43] 李政, 罗晖, 李正风, 等. 基于质性数据分析的中美创新政策比较研究: 以“中国双创”与“创业美国”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18(4): 18-30.
- [44] 范梓腾, 谭海波. 地方政府大数据发展政策的文献量化研究: 基于政策“目标—工具”匹配的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12): 46-53.
- [45] 仲为国, 彭纪生, 孙文祥. 政策测量、政策协同与技术绩效: 基于中国创新政策的实证研究(1978—2006)[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9, 30(3): 54-60.
- [46] HU Z, XIONG J, YAN J, et al.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ordination of policy mixes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an ambidexterity perspective [J]. Regional studies, 2023, 56(6): 1011-1028.
- [47] BERGER J, HUMPHREYS A, LUDWIG S. Uniting the tribes: using text for marketing insight [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20, 84(1): 1-25.
- [48] 徐国冲, 霍龙霞. 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生成逻辑: 基于2000—2017年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20, 17(1): 18-30.
- [49] HUANG C, YANG C, SU J. Policy change analysis based on “policy target-policy instrument” patterns: a case study of China's nuclear energy policy [J]. Scientometrics, 2018, 117(2): 1081-1114.
- [50] 杨灿明. 减税降费: 成效、问题与路径选择[J]. 财贸经济, 2017, 38(9): 5-17.

(本文责编: 润泽)